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FANYI YANJIU

马士奎 著

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

(1966——1976)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I206.7/197

2007

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 (1966 — 1976)

马士奎 著

A Study on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 Shikui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 (1966 ~ 1976) / 马士奎著. —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7

ISBN 978 - 7 - 81108 - 375 - 0

I. 中… II. 马… III. 文学 - 翻译 - 研究 - 中国 - 1966 ~ 1976 IV.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4193 号

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 (1966—1976)

编 著 马士奎

责任编辑 方 圆

美术编辑 秀 琴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08 - 375 - 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本课题研究范围	(1)
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状况	(2)
第三节 本课题选题原因	(8)
第四节 本书基本框架	(9)
第二章 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	(12)
第一节 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	(12)
第二节 “文革”文学翻译：百年低谷和双向文学传递 的基本平衡	(21)
第三章 集体话语与“文革”文学翻译	(30)
第一节 意识形态对译者的选择	(30)
一、“安全的艺术”和意识形态对译者的相对宽容	(30)
二、“殉翻译”现象和翻译主体的重组	(35)
第二节 集体话语和“文革”文学翻译	(39)
一、集体翻译现象	(39)
二、“文革”文学风气与集体翻译	(44)
第三节 翻译主体地位的弱化	(51)
一、译者翻译主体地位的弱化	(51)
二、集体译者文本、化名译者文本和无译者文本	(54)
三、零稿酬现象	(61)
四、“翻译机器”和“雇佣译者”	(64)
第四章 塑造文化他者 ——“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	(70)

第一节	外国文学翻译与异文化形象的塑造·····	(70)
第二节	公开译作·····	(85)
第三节	内部译作·····	(100)
第四节	潜在译作·····	(156)
第五章	塑造文化自我——“文革”时期的对 外文学翻译·····	(162)
第一节	对外翻译与自我文化形象的塑造·····	(163)
第二节	“文革”与对外文学翻译·····	(183)
第三节	毛泽东诗词的翻译·····	(203)
第四节	对外翻译文学作品的接受·····	(222)
第六章	结语·····	(231)
参考文献	·····	(236)
附录 1	“文革”期间翻译出版的部分外国文学 作品书目·····	(253)
附录 2	《摘译》(外国文艺)杂志所刊部分作品篇目·····	(259)
附录 3	“文革”期间对外翻译出版的部分文学作品 书目(限英译)·····	(267)
附录 4	“文革”期间《中国文学》杂志(<i>Chinese Literature</i>) 所刊部分作品篇目·····	(270)
作者后记	·····	(28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本课题研究范围

本课题以“文革”期间中国大陆的文学翻译为研究对象，即外国文学作品的汉译和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不包括国内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本研究所涉及的翻译活动始于1966年5月，其标志是“文革”开始及文学翻译工作（特别是外国文学翻译）的基本停顿，止于1976年底，其标志为“文革”结束及这一时期介绍外国文学状况的主要窗口《摘译》（外国文艺）的停刊。^①

严格地说，早在“文革”正式开始前的几年内，在文学翻译方面就显示出与这期间相类似的特征。上世纪60年代初，随着国际上“反修”运动的开始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扩大，文学翻译即开始走下坡路，具体表现为译作数量的急剧减少和作品类型的日趋单一；同样，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最后3年里，意识形态领域制约文学翻译的因素依然存在。直到80年代初，外国文学翻译才开始全面复兴，对外文学翻译也再度步入正轨。也就是说，“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现象与其前后几年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并没有一条十分明显的分界线。但这10年毕竟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历史阶段，单从文学翻译本身来说，这一时期在翻译主体、选材、翻译方式、译作发行范围和出版数量等方面都与其他时期存在明显差异。本课题意在发生在这一特殊历史时

① 有关《摘译》（外国文艺）杂志的情况请参照本书第4.3.1小节。

期的双向文学翻译活动进行探讨。

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状况

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者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翻译现象关注较多。自上世纪80年代初翻译研究在中国恢复以来,这一方面的著作已有多种,如马祖毅的《中国翻译史》(上卷)、^①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②王宏志的《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③、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④和谢天振等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⑤等;以建国后17年外国文学翻译为研究对象的作品主要有孙致礼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⑥国外作品有Wolfgang Bauer的《共产主义中国对西方文学的接受》^⑦等。在对外文学翻译的研究方面,马祖毅等所著《汉籍外译史》论及从古代到上世纪80年代间各种汉语典籍外译的情况;牛津大学Red M. H. Chan的博士论文《翻译的政治:后毛时期中国大陆小说的英

①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② 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③ 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④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⑤ 谢天振等,《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⑥ 孙致礼,《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译林出版社,1996。

⑦ Wolfgang Bauer, *Wester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Work in Communist China*. Frankfurt: Alfred Metzner Verlag, 1964. 除专门说明外,书中所引用的英文书名及引文均为作者自译。

译》^①则以“文革”结束至21世纪初中国大陆小说的英译为主题；其他一些港台和海（国）外学者的研究也对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现象有所涉猎，其中有3部较有代表性的论文集，即陈德鸿（Leo Tac-hung Chan）主编的《从一到多：翻译和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②欧阳桢（Eugene Eoyang）等主编的《翻译中国文学》^③和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隔离的世界：中国文学新作及其读者》，^④其中的部分文章也曾论及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作品外译及被接受的情况。

比较而言，对“文革”期间文学翻译现象的研究仍处于相对空白状态，到目前尚没有出现专门的研究著作，甚至在很长时间内连以此为题的单篇论文都没有。但这一时期的翻译现象也并没有完全被遗忘，至少有几类作品曾从不同角度或多或少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

一、上世纪70年代末见诸报刊的“批判”文章

刚刚走出困境的部分外国文学工作者曾从文艺政策等角度清算“四人帮”对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的破坏。1977年，《世界文学》杂志（当时还是内部发行）在复刊后的第1期组织了一次笔谈，参与者中有多位老资格的作家、翻译家或文艺理论家。刘白羽在“笔谈”中指责“四人帮”“控制文化舆论阵地，把外国文

① Red M. H. Chan,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Mainland Chinese Novels in the Anglophone World During the Post-Mao Era”. Diss. Oxford University, 2002.

② Leo Tac-hung Chan, ed. *One into Many: Transl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msterdam: Rodopi, 2003.

③ Eugene Eoyang, and Lin Yao-fu, ed.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④ Howard Goldblatt, ed. *Worlds Apart: Recent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Audiences*. Armonk, N. Y.: M. E. Sharpe, c1990.

学扫地出门，斩尽杀绝，简直把中国变成一个几乎看不见外国文学书籍的国家”；^① 冯牧则指出“四人帮”在对待中外文艺遗产方面采取“砸掉”和“扫荡”的政策，使得在一个时期里，一切外国文学作品都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一大批优秀外国作家“都成了禁忌的、不祥的名字”；^② 茅盾也在该刊同一期发表文章，认为“四人帮”的行为“抄袭了当年鲁迅所痛斥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使人民大众‘由聋而哑’的文化专制主义”；^③ 冯至则认为“四人帮”“在文学艺术古今中外的关系上，把古代的和外国的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作品全盘否定，对于 100 多年以来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产生的文学也熟视无睹”。^④ 1978 年的《外国文学研究》创刊号也发表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研究室《批“洋为帮用”》的文章，揭露“四人帮”“利用苏联文学搞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⑤ 这类作品对翻译行为本身少有涉及，从内容到文风都是建国后连绵不断的文学批判运动的延续。

二、一些纪念文集或回忆作品

多位翻译家曾著文谈及自己在这—特殊时期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及感受，如巴金的《随想录》、^⑥ 季羨林的《季羨林自传》、^⑦ 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⑧ 沙博理 (Sidney Shapiro) 的《我

① 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深入揭批“四人帮”，努力做好外国文学工作》(笔谈)，《世界文学》，1977 年第 1 期，第 5 页。

② 同上，第 12 页。

③ 茅盾，《向鲁迅学习》，《世界文学》，1977 年第 1 期，第 5 页。

④ 冯至，《论“洋为中用”》，同上，第 45 页。

⑤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研究室，《批“洋为帮用”——揭批“四人帮”利用苏联文学搞篡党夺权的阴谋》，《外国文学研究》，1978 年第 1 期。

⑥ 巴金，《随想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⑦ 季羨林，《季羨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⑧ 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十月出版社，2001。

的中国》、^① 萧乾的《萧乾文集》^② 和许渊冲的《追忆逝水年华》^③ 等。雷音的《杨宪益传》^④ 和邹霆的《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⑤ 都对杨宪益和戴乃迭这对颇富传奇色彩的翻译家伉俪在这期间的经历有所描述。《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⑥ 是在穆旦逝世 10 周年之际出版的一本纪念文集，书中一些文章论及这位杰出的诗人翻译家在这期间翻译拜伦的《唐璜》及英国现代派诗人作品的情况。上海译文出版社（前身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这一时期出版外国文学译作的两大出版社之一）曾出版了两部纪念文集《走过的路》和《作家谈译文》，^⑦ 其中也有多篇文章对该社那一时期的翻译出版情况作了回顾。

三、一些随笔性作品

部分在“文革”以后活跃起来的作家和学者曾谈到当时内部发行的外国译作对自己创作或学术生涯的影响，如陈丹燕所著《上海的风花雪月》中《白皮书时代的往事》一节除记述几位翻译家对当时翻译经历的追忆外，还记录了一些人在阅读“白皮书”^⑧ 时所受到的触动；朱学勤的随笔集《书斋里的革命》^⑨ 中的一些文章也谈及作者在特殊环境中阅读此类译作的感受。这些

① 沙博理，《我的中国》，宋蜀碧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② 萧乾，《萧乾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③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三联书店，1996。

④ 雷音，《杨宪益传》，北京：无出版单位，2004。

⑤ 邹霆，《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⑥ 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⑦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走过的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作家谈译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⑧ “白皮书”指上世纪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末期间国内翻译出版的苏联和西方文艺和政治理论著作。详见本书第 4.3.6.1 小节。

⑨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

从当时的译作中汲取过营养并曾从中得到启迪的读者对“文革”后期的内部译作评价甚高，如陈丹燕就曾将自己对外国文学“白皮书”的感激之情比作“安徽饥民对救济粥的心情”。^①

四、一些学术性著作

尽管它们没有把“文革”文学翻译作为研究重点，但也在某些方面有所涉及。邹振环的《二十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②一书的个别章节对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作了一些介绍；陈建华的《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③、王向远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和《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④则从国别文学的角度谈及这一时期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在这方面着墨较多的是即将出版的由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将作为一章（由周发祥执笔）。此外，一些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在考察该时的文学环境时曾谈及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情况，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⑤中《走向“文革文学”》一章即曾述及这10年间外国文学译介相对停滞的局面及该时期外国文学译作的特殊阅读方式。

以“文革”时期的对外文学翻译为研究对象的作品也比较少见，其中以毛泽东诗词外传为话题的作品相对较多。有关钱钟书、叶君健、袁水拍、乔冠华等生平的作品多提及其当时参与

① 陈丹燕，《白皮书时代的往事》，《上海的风花雪月》，作家出版社，1998，第209页。

② 邹振环，《二十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

③ 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④ 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⑤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翻译毛泽东诗词的经历；一些毛泽东诗词研究专著，如马连礼的《毛泽东诗词史诗论》、^① 胡为雄的《诗国盟主毛泽东》^② 和陈吉安的《毛泽东诗词版本丛谈》^③ 等都曾谈及毛诗外译的情况。沙博理和杨宪益等人的传记作品也大多提到他们当时翻译“样板戏”等作品的经历。在外文局成立 50 周年之际出版的系列作品，包括《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和《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等，^④ 也对这一期间对外翻译出版文学作品的情况也有所介绍。国外（海外）也有一些著作涉及这一问题，如葛浩文所编《隔离的世界：中国文学新作及其读者》^⑤ 一书中的部分文章在谈及中国“对外翻译”方式的局限时 also 对该时期的对外文学翻译现象作过片言只语的介绍。

严格说来，上述作品在涉及“文革”翻译现象时大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为数较少的学术作品主要也不是从翻译的角度出发，因此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尚未真正展开。这一阶段结束已经 20 余年，迄今基本上还无人对这一时期的翻译现象进行深入的专门探讨，多数人对当时的翻译活动尚缺乏真正的认识，对翻译行为和翻译作品的评价有失公允，甚至有人完全忽视该时期文学翻译活动的存在。如《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在评价各个历史阶段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成就时，对“文革”时期的情况只是一语带过，认为“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10 年时期，

① 马连礼，《毛泽东诗词史诗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② 胡为雄，《诗国盟主毛泽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③ 陈吉安，《毛泽东诗词版本丛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

④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新星出版社，1999；《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新星出版社，1999。

⑤ Howard Goldblatt, *Worlds Apart: Recent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Audiences*. Armonk, N.Y.: M.E. Sharpe, c1990.

文学出版园地基本上是一派荒芜,那么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则真正是一片空白。”^①在有的学者眼中,整个“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译作只有一本高尔基的小说《母亲》。^②“文革”翻译活动的亲历者在述及各自的翻译经历时也是评价不一。

在本书作者看来,翻译界对该时期翻译现象缺乏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与近代以来其他历史阶段相比,这10年间出版的译作数量相对较少,真正在翻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品更少,人们普遍对这些负有特殊政治使命的译作在当时起到的作用及其实际意义缺乏足够认识,研究对象的价值往往会左右人们的研究兴趣,故而该时期的文学翻译现象也常常被认为缺少研究价值;二、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距今时间较近,尚需历史的沉淀;三、该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有着非常复杂的政治背景,政治上的敏感性也是影响这一研究进一步展开的原因;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翻译界的研究者过分拘泥于译作文本本身,对翻译活动所赖以进行的社会文化环境关注不够,研究者的视野受到限制。随着翻译研究的日趋繁荣和研究者视域的不断扩展,相信人们会对该时期的翻译现象投以更多关注。

第三节 本课题选题原因

本课题之所以首次将“文革”期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双向文学传递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笔者对该时期翻译活动意义及其研究价值的认识。毋庸置疑,“文革”10年是文学翻译百年来

^① 曹治雄,《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421页。

^② 臧仲伦,《当代中国的翻译》,孔慧怡、杨承淑编,《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第153页。

的一个低谷，而且译作结构也不合常态；但从总体上说，它既不是完全空白，也非微不足道。到“文革”中后期，文学翻译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尤其以原语文化中畅销书为主体的“内部译作”对苏、日、美3国（尤其是前二者）的重要文学现象和社会现实有相对比较全面的反映，许多作品在其原文化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译作在文学作品极端匮乏的时期更显其特殊意义，远远超出了政治批判的范畴；以外国文学名著为主的“潜在译作”^①多出自国内最优秀的作家翻译家之手，在出版之后大都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经典之作；该时期的对外文学翻译所受影响相对较小，如果以同时期国内文学创作为参照，这10年间新创作的文学作品对外译介的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历史阶段；尽管这一时期风行的作坊式集体翻译不尽符合文学翻译自身的规律，但由于众多高水平译者的参与，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评判，许多译作的质量也属上乘。该时期的译作和译者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也不可忽视或过于低估，应该得到一个公允的评价。另外，这期间的翻译活动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自有其特色，通过这一极端的例子，可以对翻译行为的复杂性及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有更好的认识。

第四节 本书基本框架

本课题把“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放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中进行考察，不将其视作单纯的语言行为，而是更多地考虑翻译现象与其背后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全书以意识形态与文学翻

^① 指完成或基本完成于“文革”期间，但在当时没有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详见本书第4.4节。

译之间的关系为线索,对“文革”期间的文学翻译现象从翻译主体到双向翻译活动进行全面透视。

本书由绪论、主体和结语三部分组成。

第一章绪论包括本课题的研究范围、研究现状、选题原因等内容,并对各章节内容作简单介绍。

第二至五章为该书主体部分。第二章首先对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翻译的政治性问题进行阐述,然后论及这一规律在“文革”语境中的具体表现。文学翻译行为既受制于意识形态,同时又服务于意识形态,按意识形态的要求去塑造原语文化的形象。在“文革”意识形态背景下,一方面,外国文学翻译陷入空前低谷,双向文学翻译的规模和译作数量趋于接近;另一方面,文学翻译的政治功利性达到了新的高度。该章的目的在于为下文对当时双向文学翻译现象的全面探讨做好铺垫。

第三、四、五章论及“文革”意识形态背景下文学翻译的具体表现。其中第三章是翻译主体研究。这一时期的翻译主体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权力机构和主流意识形态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重新选择译者;集体翻译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翻译方式,多数译作都是集体话语的产物;同时,译者在翻译行为中的主体地位也更趋模糊化,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立场的翻译组织者(发起者)成为整个翻译过程中更具决定性的因素。翻译主体的变化是当时意识形态的产物,同时也是塑造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原语文化形象的需要。

第四章是是对该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状况的研究。“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主要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而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翻译行为的目的简单化为对某些具体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充当目的语社会的参照。按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这期间的外国文学译作有三种存在形式——公开译作、内部译作和潜在译作。三类泾渭分明的译作在目的

语社会的不同范围内塑造出三种不同的异文化形象。本章即从这三个层面，并且从文本和副文本两个角度入手，探究各类译作在塑造异文化形象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第五章主要探讨该时期的对外文学翻译状况。对外文学翻译是在异文化中塑造自我文化形象的手段之一。较长时间内，这种译出母语的翻译形式在中国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尤其在这 10 年间，中国译者所从事的双向文学翻译达到了暂时的相对“平衡”的状态。在“文革”意识形态背景下，对外文学翻译进一步成为对外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其意图在于向外界展示新的自我文化形象，同时也是配合当时国际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种方式。在所有外译作品中，本书对毛泽东诗词、“样板戏”和浩然等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给予较多关注。本章最后还将论及外译作品在异文化中的接受情况。

第六章结语部分以上文对具体翻译现象的研究为依据，尝试对“文革”时期的双向文学翻译行为作出总体的价值评价，并将其放在历史的坐标上加以考察。

书末附有本书作者整理出的“文革”期间出版（发表）的外国文学译作和对外文学译作书（篇）目以及本书参考文献等内容。

第二章 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

本章从翻译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功能机制入手，探讨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在“文革”语境中的具体表现。一方面，翻译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为意识形态所左右，意识形态的影响常常渗透到翻译行为的每一个环节；另一方面，翻译也常常成为服务意识形态的工具，按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要求去塑造原语文化的形象。在“文革”背景下，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及文学翻译行为的政治功利性都表现得更为突出。

第一节 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

从意识形态角度考察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翻译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个新趋势。在新的研究视野中，翻译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行为，它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总会带有其赖以发生的那一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

意识形态亦即社会思想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内容，是一定社会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其中政治思想和哲学是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因素。意识形态渗透于翻译活动的各个环节，其对翻译行为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译者、作品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等诸方面。包括文学翻译在内的翻译活动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意识形态影响翻译行为；另一方面，翻译活动常常荷载一定的政治使命，为一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服务。